

學林

◀ (上接5版)

也!自是尘无之死且证实,尘笠乃复踵灵犀许,白以乡人之言,尘笠已泣不可仰矣,朋友闻者,无不怆然,今将由至友若千人,为之开一追悼会,又为之延高僧追荐。读吾报者,亦有佩尘无之清才绝调者乎?读此文竟,又岂可不临风雪涕,以吊此凄凉绝世之才人哉!《尘无以呕血死矣》)

三年之后,尘无遗著《浮世杂拾》乃由长城书局梓行。此书系“长城文艺丛书之一”,由桑弧特为搜集、整理、编辑,以纪念亡友。全书收其《寂寞的街头》《三和尚的死》《卖笛的老人》等抒情散文26篇,另有《小引》、柯灵序言、桑弧所撰《校印后记》。据柯序可知,这些文章是王尘无生前亲手从各报上剪存,“还在稿端注明‘改’或‘大改’字样,预备重加饰润”。但桑弧《校印后记》则称之为“中国文坛”“最优秀的散文作家中的一个”,还与陆小洛异口同声、咸谓其为“鬼才”,似不免过誉甚矣。

《浮世杂拾》一集,未及王尘无之旧体诗文、通俗小说、影评作品,但影评、杂文方面此后尚有《王尘无电影评论选集》(广播电影电视部电影局党史资料征集工作领导小组、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编,北京:中国电影出版社,1994年)可作补充。该书未编,另收不少关于王尘无的回忆资料,唐大郎的大量论述当然被遗漏在外,而王氏的诗文、小说之什,至今仍未见结集出版。

其实,桑弧曾有意将王尘无诗集及《吞声小记》两种、施叔范之《酒襟清泻录》及诗稿、钱梯丹之《陇上语》《西征闻见录》及《破家赘录》(均为连载作品)、“亦并付敬贖”(《纪念集》误作“敬厥”),“然纸价日增,印刷费复极昂贵,使为其友者,欲

偿素愿不可得,即此《浮世杂拾》之产生,盖亦耗桑弧之绝多心力矣”。(《亡友尘无》《桑弧拟印书》)此后终未见下文。印证了唐大郎这番颇有几分预言色彩的甘苦之言。

从唐大郎关于王尘无的这些记述中,我们可以发现:另有一个作为旧式文人、小报文人、通俗小说家的王尘无,已悄然浮出历史地表。更重要的是,这多重身份、面相的王尘无,不仅与左翼影评人王尘无同在,而且同为一入,令人殊感意外。此一点,我们不读《纪念集》,或恐难以知悉。不止此也,正如前引拙文所论,二三十年代的左、右翼文人、影人之间,也并未如我们想象得那样势如火水、老死不相往来,而在形形色色的都市空间、公私场合晤面,且在报章杂志、言论空间多所互动(“论争”何尝不是一种互动?),恰恰是其常态,至今犹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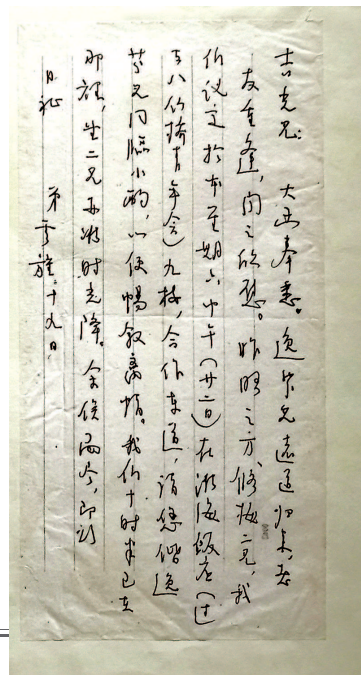
不过,唐大郎所熟知的王尘无,只是1933、1934年至1938年的王尘无,且其更表现出旧式文人、小报文人、通俗小说家的一面。这也许会给读者一种误会,其在这短短四五年时间,或已发生了某种变化、转折。其实不然。虽然“软性电影”论争至迟于1936年几已尘埃落定,但直至1937年、亡故前一年,王尘无仍在积极撰写影评、剧评,而其旧式文人、小报文人、通俗小说家的一面,显然同时系于一身,贯穿于其全部人生旅程(如果不是更早的话)。但在四五年间,一人之思想、人生发生变化者,并非绝无仅有。王氏所批判的穆时英即如此。自1933年夏光华大学毕业,步入职业生涯,至1939年10月返沪,加入汪记、直至翌年身死,其思想观念与人生履痕一变再变(王贺:《穆时英



◀ 约1947年唐大郎和文艺界人士合影,第一排金山,二排左二、左三为冯亦代、郑安娜夫妇,左四为丁聪,三排左一为唐大郎、左二为张瑞芳、左三为龚之方,四排左一为魏绍昌、左二为张俊祥



唐大郎夫妇60年代初在上海豫园合影。



◀ 唐大郎致姚吉光信

的职业生涯、收入及其创作》,《上海书评》2018年6月28日;《穆时英职业生涯新证》,《文汇学人》2019年4月26日),整个三四十代文人的创痛、挣扎、背叛、苟且之运命,似亦已集中于穆时英一人。相较之下,王尘无虽有左翼影人、旧式文人、小报文人、通俗小说家等多重身份、面相,但是否留有第一流的文学和思想遗产,有待今人批

判、继承、发展,迄今仍是一未知数,而其带给我们的印象,似仍显得有些单调、平淡。

但在《纪念集》中,包括王尘无在内的诸多近现代文人、影人、学人、艺人、书画家的研究资料,实不知凡几。该书的文献史料价值,正如我在《纪念集》首发式座谈会上所谈,至少可从以下四个不同的脉络当中来理解:

第一,诗文、掌故写作的传统(尤其明清以降),包括其与出版业、大众传媒的密切关系。一般所知之近代掌故家只瞿兑之、郑逸梅、陈定山、高伯雨数人,其实唐大郎亦属个中翘楚,其同时代人如徐彬彬(如《凌霄汉阁谈荟》)、汪仲贤(如《倒灶室笔谈》)、林庚白(如《双梧书屋笔记》)等,亦有不少掌故文字发表,有心人正可衡短论长、仔细商量。

第二,通俗文学的脉络。唐大郎笔下对张恨水、秦瘦鸥、包天笑、潘柳黛、苏青、张爱玲等人,都有很多记述和评论,对我们认识这些通俗文学作家及其作品,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。

第三,电影、话剧、旧剧(曲)生产的脉络。本文所论王尘无即是一例,至于费穆、桑弧、洪深、欧阳予倩、舒湮、梅兰芳、荀慧生等艺苑名家,此集中亦有不少笔墨,可助识者综合新旧文献,构会甄释。

第四,在四五十年代文学和社会的转折中,小报和小报文人如何调适、妥协直至失败的整个文学生产场中,重新审视其作为另一种现当代文学的丰富性、复杂性及限度。

(作者单位: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)



1940年1月23日卡尔登演出《雷雨》后合影,后排左二为唐大郎



唐大郎(高唐)《高唐散记·序与跋》版面,刊1947年12月2日《铁报》